

典籍外译中译者“把关人”角色研究

——以《论语》中一句话的翻译为例

高查清¹, 凌双英²

(1.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系, 合肥 230051; 2.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合肥 231131)

摘要:在当前树立“文化自信”、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背景下,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渠道。中国典籍博大精深,部分文本艰深晦涩,很容易误解、误译。以《论语》中一个句子的翻译为例,阐释译者在典籍外译过程中,必须在深刻理解典籍原文的微言大义、切实照顾外语读者的文化空白、精心挑选译本以及合理使用翻译方法与策略等方面做好把关工作。

关键词:中国典籍;外译;译者;把关人;翻译方法与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3-0017-06

近代学者钱振东有言曰:“文化之于国家,犹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1]398}中国典籍是中国历代重要文献的积累,它记录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取得社会进步的全过程,记录了古圣先贤的思想、时代发展的烙印及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反复淘洗所积淀的精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优秀的典籍介绍给其他国家的读者,在传播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典籍外译离不开译者。在典籍外译过程中,从外译活动计划的酝酿到作品的选择,从对原文的分析与理解到翻译方法和策略的运用,甚至到译文风格的确定乃至出版商的选择等各个方面,译者都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是翻译活动天然的“把关人”。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典籍外译活动中,译者应该如何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形象,如何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如何“把关”,就值得好好研究。

一、中国典籍的特点与“把关人”内涵

(一)中国典籍的含义及特点

《当代汉语词典》对“典籍”的解释是:(1)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2)泛指古代图书。^{[2]280}很显然,该词典把典籍定义为古代图书,尤指古代法制方面的图书。事实上,中国典籍“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和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流变”^{[3]2},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以至于《隋书·经籍志》誉之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4]1}显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只有那些被人们奉为经典的书籍,“特别是具有原创性思想和系统性知识的书籍才是典籍(或经籍)”^{[5]189}。将《当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和《隋书》的定义结合起来,典籍可理解为涉及宗教、史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文化、教育、军事、科学、技术、医药、学术、典章制度等方方面面的中国历史上(尤指古代)有重要影响的经典著作。

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化互为表里,二者密不可分。《中国文献学概要》如此描述二者关系:“典

收稿日期:2019-09-2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译者‘把关人’角色研究——以中国典籍英译为例”(SK2019A092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诠释学视域下理雅阁《易经》译本的特征与影响”(AHSKY2018D10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翻译生态环境下中国典籍《孙子兵法》中外交委婉语的英译研究”(SK2018A0841)

作者简介:高查清(1968—),男,安徽庐江人,教育学博士,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系教授;凌双英(1970—),女,安徽歙县人,文学硕士,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享,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6]7}。中国典籍积淀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故此浩如烟海,规模弘大,存留之丰,为世界所仅有,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又赋予了中国典籍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由于远古时代中国文字系统的发展远未成熟(据传《周易》成书时常用汉字仅一千八百多个),因此想要用数量严重不足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思想,就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作者不得已之下只能“东挪西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互用现象非常常见,通假字俯拾皆是,导致不少词句具有多义性甚至很容易产生歧义。另外,中国古代文士特别追求言简义丰,有些文本的语言过于简洁凝练(如《周易》《道德经》等古籍),加上当时语言的句法结构与现代语言多有不同,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也与当今时代差别巨大,导致大部分古籍在阅读的时候颇费力气,理解起来很不容易。即便本土读者,阅读典籍时也需借助工具书。将典籍翻译成外文时,遇到的问题必然更多、更复杂,因此“把关人”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二)“把关人”的内涵及源流

《大学》有言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深入了解“把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就必须了解一下其发轫与源流。“维基百科”对于“把关”(gatekeeping)的解释是“为了传播而对出版、广播、网络和其他任何交际信息的筛选过程”。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科特·雷温(Kurt Lewin)就把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对信息进行过滤与加工的人称作“gatekeeper”(即“把关人”或“守门人”。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这两个词汇可视为同一概念。)自此之后,该词“有权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事物的个人或群体”的隐喻义被迅速用于社会学、大众传媒、信息科学以及诸如组织管理、公共卫生、政治学、公共政策、教育学和法学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传播学者怀特(D. M. White)将“把关人”概念引入新闻传播领域,提出“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1959年,麦克内利(McNelly)通过对国际新闻传播过程的研究,论证了在信源与信宿、新闻事件与终端受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层层把关及反馈环节”,完善发展了怀特的理论。1965年,盖尔顿和鲁奇(Galtan & Lodge)提出了“选择性把关”(selective guarding's doors)模式,指出“把关人”在选择或淘汰新闻内

容时持有一套客观的、系统的标准。1969年,巴斯(A. Z. Barnes)注意到不同“把关人”之间的差异,提出了新闻传播中新闻采集与新闻加工的“双重行动模式”;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将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归纳,提出了大众传播信息中个人、媒介工作常规、组织、媒介外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系统等把关过程“五个层面”的“多元把关模式”,指出“把关人”在把关时需要在传播惯例的限制和传播组织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传播组织也会受到媒介以外社会团体力量的影响和社会系统的制约。1988年日本学者藤井章雄(Akio Fujii)将“把关人”概念与新闻翻译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至此,“把关人”理论才算真正与翻译建立起联系。随后,芬兰学者沃里宁(Erkka Vuorinen)将休梅克关于“把关人”的多元模式引入到新闻翻译研究中,并大胆提出翻译(尤其是新闻翻译)中对文本的任何操纵,如信息的增删、替换、重组等,都应视为“把关”行为。可以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把关”理论被正式引入翻译研究的时候,起先涉及的只是新闻翻译,但随后就逐渐向整个翻译研究领域扩展。吴自选认为,在对外传播翻译中,译者进入了对外传播的过程,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译者同编辑、记者等一样也是一个传播者,因此也是一个“守门人”(作者注:即“把关人”)^{[7]54}。典籍外译活动中的译者当然也不例外。

二、《论语》“公冶长篇第五”典型句及译文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典籍里的不少文献去今甚远,其字形、字义、句法都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有很大不同,如果不认真揣摩,有时很难读懂。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把翻译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8]144-151},典籍翻译却独占其二。它不仅涉及语内翻译,而且还涉及语际翻译——先译古为今,然后再译中为外。其中的任何一个步骤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译文背离原文,导致无法将原文的意旨传达给国外读者。

《论语》“公冶长篇第五”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有人将其今译为:

孔子说：“臧文仲替一只叫蔡的大乌龟盖了间房，有巨大的斗拱和画着藻草的梁上短柱，这个人的聪明又怎么样了呢？”^{[9]47}

此译，或者说如此理解该句是否正确呢？

事实上，该句中的“蔡”为“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长尺有二寸”^{[10]59}。也就是说，“蔡”是一国之君才可以拥有的用来占卜国运的龟壳，长一尺二寸。因为“蔡”是此龟的产地，故以“蔡”名龟。“节”者，柱上支撑大梁的方木也。“桷”者，梁上短柱也。“山节藻桷”，盖为藏龟之室，而刻山于节、画藻于桷也，言其奢侈。“知”即“智”，“何如其知”即“其智何如”，意思是“怎么能谈得上智慧呢”。《皇疏》曰：“礼，唯诸侯以上得畜大龟以卜国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鲁大夫而畜龟，是僭人君礼也。”也就是说，依据周礼，只有诸侯以上才可以拥有大龟以作占卜之用，大夫以下不得拥有，而作为鲁国大夫的臧文仲拥有大龟，是僭礼的行为。“居蔡”已然是僭越之为，文仲还为“蔡”建了“山节藻桷”之屋，此为变本加厉也。所以，尽管当时人们称臧文仲为“智者”，但因为公然违反周礼的规定，竟然藏有诸侯以上职位方可拥有的著龟，且将藏龟的屋子装饰成天子宗庙之形貌，所以对于文仲如此以下犯上的行为，孔子愤慨之余又不以为然：“非时人谓之为知。”质疑“何如其知也？”言下之意，这种愚蠢、越礼之人，又怎么能算得上明智呢？

所以，孔子在本句中并非指责臧文仲为“蔡”建房以及该房的气派，而是指责他不守君臣之礼，私自大胆“居蔡”，属于严重的僭越犯上行为，故而称其为不智。所以，该句可译为：

臧文仲收藏了一只大龟甲，并且藏甲之屋的斗拱雕成山的形状，短柱上饰以水草花纹，（能够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怎么能算明智呢？

可见，该句的今译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准确的，没有表达出句子的原意，更没有表达出言者所指。

正如上文所说，如果在译古为今时出现错误，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后一个过程（即译中为外）出现偏差就在所难免了。

比如，有人将该句英译为：

Zang Wenzhong, said the Master, kept a divine tortoise in a hall with hill patterns

on the pillars and duckweed patterns on its beams. What did he know of the rites?^{[11]35}

回译为汉语即：

夫子说，臧文仲养了一只神龟，放置大龟的厅堂的柱子雕成山的形状，梁上饰以水草花纹。对于典礼，他懂得什么呢？

这样的译文看似流畅，但英语国家的读者能够从中捕捉到原文的真实信息吗？很可能他们读了译文之后，只知道有个叫 Zang Wenzhong 的人养了一只 divine tortoise，并给此龟建了较为考究的厅堂，如此而已。但他为什么要养龟呢？为什么又要给此龟建“豪华别墅”呢？并且这些和典礼(rites)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最后一句“何如其知也”在英语译文中也看不到。如此翻译，怎能让英语读者理解 Zang Wenzhong“居蔡”之举已经犯了僭越之罪呢，又怎能让他们读懂孔子对于 Zang Wenzhong 的不满、不屑、批评和嘲弄呢？所以，这样的译文看似流畅易懂，实则不知所云，让没有相应背景知识的英语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要想准确翻译该句，译者必须要理解原文的语境及其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甚至要洞悉孔子其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主要思想，知道“臧文仲”是谁，知道关于“蔡”的典故与含义，知道“节”与“桷”的所指，知道动词“居”的意思（有人认为“居”为使动用法，“使……居”之意^{[9]47}），知道“知”即“智”的通假用法，以及“山”与“藻”的名词动用手法，知道孔子质疑臧文仲“何如其知也”的背景是“时人谓其知”。由于缺乏古文知识以及对文化背景不够了解，很多人把“蔡”解为“大龟”，把“居蔡”译为“养着一只大龟”。基于如此理解，许渊冲先生很自然地就把“居蔡”译为英文“kept a divine tortoise”，理雅阁和辜鸿铭的译文是“Tsang Wen kept a large tortoise in a house”和“The man actually built a chapel elaborate with carvings for a large tortoise which he kept”。也就是说，三位大名鼎鼎的译者都不约而同地误把“藏/据有一只大龟之甲”理解作“养了一只大龟”。但事实上，“蔡”并非“大龟”而是“龟甲”。刘宝楠、皮锡瑞就作了清楚的解释：“蔡，国君之守龟。”^{[12]189}何谓“守龟”？“守龟”乃“天子诸侯占卜用的龟甲”——很清楚，“蔡”为

“龟甲”而非活龟。三位译者之所以犯了同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或者说是忽略了一个背景知识,那就是中国古代经常用于占卜的工具乃龟甲和蓍草,而非活龟和蓍草。清王永彬曰:“卜筮以龟筮为重,故必龟从筮从乃可言吉。”^{[13]307}意思是,古代人占卜的时候以龟甲和蓍草为主要工具,所以一定要龟卜及蓍占都赞同,做那件事才称得上吉。

考虑到国外读者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的知识空缺,可以将该段作如下翻译:

The Master said, “Zang Wenzhong keeps a huge tortoise shell in a large house with mountain-shaped carved arches and columns decorated with aquatic grass as if he were a duke or a prince. How can we consider such a man to be wise?”

三、中国典籍外译中译者把关的要素

通过分析以上典型句及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把关工作:

首先,必须要深刻理解典籍原文的微言大义,确切领会作者的意旨。准确理解原文是典籍外译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翻译工作的起点。不能透彻理解原文意旨,如何能够以此为基础进行翻译,如何能够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哲罗姆在《约伯记》译文的序言中说:“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只能翻译已经弄懂了的东西。”^{[14]27}在《圣经》首五卷译文的序言中他还说:“句子要靠译者的博识与精通语言才能理解、翻译。”^{[14]27}中国典籍中的不少篇章言辞简约,深奥隐晦,如果译者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没有按图所骥、刨根问底、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能吃透文章意思,只是一知半解,望文生义,在“以己昏昏”的情况下又怎能企望“使人昭昭”,怎能准确地再现原文本义?又怎能圆满完成把中国博大精深的典籍和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介绍给世界的任务?

其次,由于国外读者缺乏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了解,译者要做好充分的预估和足够的文化预设,把好典籍外译中的文化背景关。在译中为外的時候,仅仅自己明白原文的确切含义是远远不够的。绝大部分国外读者对中国古代汉语知识及中国文化的相关典故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在翻译的时候要视

具体情况适当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冯全功指出:“由于语言、文化、社会情境等方面存在差异,目的语读者对部分信息了解程度有限,可能构成信息阅读与传播上障碍,因此,必须对某些信息进行适度解释。”^[15]例如,将上句译为外语时,译者就至少要以适当方式对臧文仲的身份、“蔡”(即大龟,此处指龟甲)的用途及君臣占卜用的龟甲的大小、时人对臧文仲作智者的评价等背景知识加以介绍。如果不把上述背景知识交代清楚,国外读者如何知道臧文仲持有“蔡”乃僭越之行,又怎能理解孔子质疑“何如其知也”的起因?

当然,以何种方式来补充这种文化背景知识,是以脚注或尾注的方式,还是以文内夹注的方式(类似于英语中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或同位语结构),译者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三,在译本的选择上,译者还需要和外译的其他相关方协调一致,做好把关工作。典籍外译的根本目的是宣传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典籍规模弘大,卷帙浩繁,所以,在开始翻译典籍之前,译者有必要作文本上(即典籍种类)的选择,“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中算最好的……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较先翻译的……问这本书译过之后,是否大众看得懂……问这本书译过出版之后,大家读了生何样效果”^{[16]62}。也就是说,在选择作品的时候,首先要衡量作品本身的价值,挑同类中最好的翻译,然后再考虑该书的译本在国外的传播效果。因为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说,如果选择的文本不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那么一定程度上该文本还没有翻译就已经失败了。要选择一些易被国外读者接受、喜爱,“在翻译过程中其原有的风格、创作特征、原作特有的‘滋味’”可以“基本保留下来并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17]245}的作品。在谢天振看来,“编译一本诸如《先秦诸子百家寓言故事选》《聊斋志异故事选》《唐宋传奇故事选》也许比你花了大力气翻译出版的一大套诸子百家的全集更受当代西方读者的欢迎”^{[17]252}。一句话,在外译典籍的选择上,不宜贪大求全。另外,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还应当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备、专业特长以及对文本价值的衡量,根据当时的翻译环境和委托人的要求,以及目标语读者的意识形态、文学偏向等,对译文本加以挑选,再根据其轻重缓急,安排好翻译计划。

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典籍外译在宣传中国

文化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使命,所以译者应该选择一些能够反映中国人民勤劳、智慧、诚实、勇敢、文明、礼貌、虚心好学等有利于提高中国形象的文本,自觉加入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潮流中去,让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之中,为人类发展做贡献。要认识到,现在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可能的话,在选材时注意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睦邻友好的文本,选择一些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惠及四邻的文本。

其四,译者要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在翻译的方法与翻译策略上进行把关。此处,翻译方法指的是采用对译、换译、增译、减译、转译、分译、合译等全译的形式,或者采用摘译、编译、改译、阐释、参译、缩译、译述、综述、述评、译评、译写、仿作等变译的形式进行翻译。翻译策略指的是“异化”或“归化”两种翻译手段的选择。

不少中国典籍规模宏大,全面、系统地翻译不仅耗时久,而且也会出现人手短缺,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此时,就可以考虑在传统翻译方式以外,以缩译或者述评的方式进行处理,尽早把优秀的典籍介绍出去。有些典籍总体上来看无比珍贵,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条件和思想方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某些地方也掺杂着一些糟粕。典籍中不乏有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思想的文献,但同样存在一些反映剥削阶级特权思想、君权神授、等级观念、忠孝思想、歧视妇女、我族中心主义等带有时代烙印的愚昧、落后思想的典籍。比如,《论语》是中国古代教育典籍的重要代表,其中有很多闪烁着人类哲学智慧和高明教育思想的凝练短句,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但同样也存在着一些反映剥削阶级思想的句子,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以及一些关于封建孝道的言辞,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同一本书,里面既有闪光点也有不足之处,到底是采用全译的方式,还是采用变译的方式,这就需要译者根据目标读者的情况以及译入语国家的相关情况统筹考虑,再作出合适的决定。毕竟,“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除了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外,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8]。换言之,这些因素都是译者

把关的内容。

“对外传播的预期效果是所提供的内容能够为境外人士听懂、看懂,乃至喜闻乐见”^{[7]59},所以,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译者应该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所谓“归化”翻译,就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用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策略。毕竟,“我们不仅需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19]。所以,“要尽量采取归化策略及‘跨文化阐释’的翻译方法,使译作阅读起来流畅自然,增加译本的可接受性,避免过于生硬和陌生化的文本”^[20]。

“对外传播中的译者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传统翻译研究中所认定的角色,即译者是仆人或隐形人”,而是要发挥更大的主体作用。这种主体作用不仅体现为译者根据自己对翻译工作的性质以及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认识“对原文把关”,而且还体现为译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其自身的社会、文化、个性、心理等因素会影响到译者“以何种方式、通过何种手段去把关”^{[7]54}。对原文把关,不仅意味着对作品本身价值和作品选择上的把关,而且意味着要透彻、准确地理解自己所选择的作品,不误解、不扭曲原文作者的本意。仔细考量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读者的阅读习惯及文化空白等文外因素,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同样是译者把关的依据和内容。

在典籍翻译实践中,实施把关行为的主体不仅仅是译者一个方面,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译者都是其中最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一方。在把关的内容上,译者要把关的因素也远不止笔者所提及的这几点,而是涉及翻译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把中国典籍翻译得准确、流畅,让国外读者看得清楚、明白,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与各国人民分享,是译者的责任与担当。

参考文献:

[1]王余光.藏书四记[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

[2]莫衡,等.当代汉语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4.

[4]长孙无忌,等. 隋书经籍志:卷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5]黄发玉. 学术论——学术的文化哲学考察[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6]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吴自选. 对外传播翻译:思考与实践[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8]Jac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1959)[M]//Schulte Rainer,Biguenet Joh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2.

[9]论语[M]. 杨伯峻,杨逢彬,译注. 长沙:岳麓书社,2011.

[10]朱熹,等. 名家批注论语[M]. 崇贤书院,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11]许渊冲. 论语:汉英对照[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

[12]刘宝楠,皮锡瑞. 论语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出版社,1993.

[13]王永彬. 围炉夜话[M]. 陈明,汪真秀,注评. 北京:金盾出版社,2016.

[14]谢天振.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5]冯全功. 论新闻译者的把关行为与素质要求[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2).

[16]傅斯年. 译书感言[C]//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17]谢天振.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8]谢天振. 谁来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J]. 文景,2005(5).

[19]谢天振. 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国文化[N]. 辽宁日报,2008-05-09.

[20]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Study on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as “Gatekeepers” in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 of a Sentence in *The Analects*

GAO Chaqing¹, LING Shuangying²

(1. Department of Arts and Sciences, Anhui Communication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fei 230051,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hu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efei 2311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dvocating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and enhancing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is both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a channel for Chinese culture to “go out”. Chinese classics are broad and profound, and some of the texts are difficult and easily misunderstood and mistranslated. By use of an example of English version of a sentence in *The Analects*, it is elucidated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understanding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original texts, taking care of the cultural blanks of foreign readers, selecting translations carefully, as well as exploiting proper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ng into foreign languages; translator; gatekeeper; translation method and strategy

(责任编辑 合 壹)